

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争夺的阵地

——谈恩格斯与杜林围绕达尔文进化论的论战，驳姚文元的“代替论”

卢 继 传

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德国的江湖骗子杜林跳了出来，大吵大嚷，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实行全面的变革，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写下了光辉的战斗著作《反杜林论》，对这个狂妄的杜林的谬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对他的阴谋诡计也做了彻底揭露。

恩格斯同杜林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展开的。它涉及到许多重要的自然科学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正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恩格斯对杜林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今天的文痞姚文元的揭露和批判。

论战的实质

现仅举恩格斯与杜林围绕达尔文进化论所展开的论战，做个介绍。

论战要点如下：

第一，杜林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无耻谩骂，攻击生存斗争理论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批判杜林妄图否认达尔文进化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是建立在广泛实践基础之上的。他参加了五年的环球旅行，做了艰苦的科学调查。在大量生物进化事实面前，使他相信物种是可变的，否认了物种不变论。后来，他又进一步考察了英国农牧业的生产实践、人工培育新品种的事实。于是，他对生物进化的探索得到了证实，即生物物种具有变异的特性；不同种的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同时，他发现了人工培育的新品种，是由于人工选择的结果。他继续研究了生物在自然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情况，又发现了物种变化的原因，即生物具有很高的繁殖率，由于每一胚胎的个体都力争成长，但自然界的生活环境又不允许，从而产生为生活而斗争；在斗争中，有些个体变异对生存有利，得到生存，遗传后代，有些个体变异对生存有害，则被淘汰，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的基本思想。达尔文正是研究了大量的生物进

化事实，建立生物进化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杜林硬说达尔文生存斗争理论是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寻找得到的，具有它所固有的一切缺陷。这是有意刁难。生存斗争在生物界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肉食动物要捕吃草食动物；不同种的植物要互相争夺养料、阳光等等。“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但由于达尔文的阶级局限性¹⁾，承认了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在生物界应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这是错误的。但不等于生存斗争理论来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

杜林还攻击生存斗争是兽性。他说：“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恩格斯严正地指出，这是杜林为篡改达尔文进化论，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以便自由地发泄他的满腔愤怒。达尔文明确指出，生存斗争的含义非常广泛。它不仅表现为动物之间的直接搏斗或吞噬，而且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夺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生物跟同种生物的斗争；生物跟不同种生物的斗争；生物同外界生活条件的斗争。显然，杜林是蓄意通过歪曲、攻击生存斗争，来否定达尔文进化论。

恩格斯充分地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意义。他指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达尔文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深入研究生物界的客观发展规律是有深远意义的。这一点，恩格斯这样说：“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照耀下，生物学才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杜林攻击达尔文进化论是从“虚无中得出自

1) 作者在《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一文中已作了分析。（见本刊1976年第二期）

己变化和差异”。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的“目的论。”

达尔文是想找一种长远意义的合理形式来解释生物进化规律。他通过自然选择来说明,旧物种是怎样变化为新物种的普遍化形式,但没有说明引起个体变异的原因。对此,恩格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确立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科学——遗传学。那时,关于生物个体变异的原因还不清楚。达尔文和所有的生物学家没有研究变异、遗传的原因,这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决不能说变异是“从虚空中产生”的。正如,育种工作者利用变异的个体,培育新的品种,难道他们不能解释变异的原因,而否定真实的变异的物种吗?

海克尔用适应与遗传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生物的进化,他认为,生物为了适应于改变了的生活环境而发生变异,同时要把祖先遗传给它的特性保持下去。适应和遗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适应是同一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同一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由于适应和遗传的矛盾斗争推动生物进化。

海克尔的进化思想引起了杜林的恼怒。他说:生物对生活环境的真正适应,“要以观念所决定的推动和活动为前提”。换言之,生物的适应特性不是生物界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而是观念给予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于是,杜林指责海克尔使用“适应”这个名称,是等于把观念引入了自然界,从而陷入“降神术”,这是倒打一耙。

恩格斯指出:生物的适应性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决没有什么神的意志和目的。许多动物有保护色,如食叶子的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这些颜色适应于生物的环境,保护自己的生存。适应这一概念是从客观事实得出的,是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根本对立。“目的论”认为,生物的适应是上帝有目的创造和安排的。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把“目的论”从最后盘踞的自然科学领域中驱逐出去。

可是,杜林主张适应以“观念”为前提,即生物的适应性必须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只有靠上帝来完成。杜林早就这样说:“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而且“它也具有意志。”可见,杜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的鼓吹者。可是,他一方面反对海克尔讲的生物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坚持说,自然界是有“目的”的活动。这就是,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有目的创造的;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是神赋予的有目的的行动。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于

是,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的确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泛神论与自然神论都承认神的存在。但是,前者讲的神不存在于自然界之外,即自然界本身;后者讲的神是超自然的,是引起自然界事物活动的“第一推动力”。所以说,杜林用“目的”这座桥梁并没有解决从静过渡到运动,而是从泛神论走到自然神论。因此,真正陷入降神术的,不是海克尔,而是杜林。

第三,杜林攻击达尔文的遗传理论进入“绝境”,恩格斯进一步批判杜林的“目的论”。

杜林硬说,达尔文断言,现有的一切生物是从一个原始生物传下来的。按照这个前提,他提出,一旦生物之间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达尔文进化论就“陷入绝境”,即无法从现存的生物一代代追溯到它的始祖。这是杜林强加给达尔文的。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造物,而是少数一种生物的直系后代”。这就是说,物种之间有亲缘关系。海克尔进一步叙述:“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此外,“还有若干单细胞的原生生物的品系”,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是“从一个独立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杜林为什么要捏造一个唯一的“原始生物”呢?一方面是杜林唯心主义的主张。因为,宗教把“亚当”当作是整个人类的始祖,所以杜林也把唯一原始的生物与“亚当”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事实果真像杜林强加给达尔文那样的话,那么达尔文进化论则成了荒唐的“创世记”了!

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有待科学解决的课题。例如,十九世纪中叶,恩格斯揭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给生命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是,那时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蛋白质。因此,恩格斯说:“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我国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之后,其他几个国家也合成了几种蛋白质,但自然科学仍未能全部解决人工制造生命的重大课题。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总有一天,人类可以合成有生命的机体,弄清生命起源。利用科学尚未全部解决的问题来责备达尔文,正是暴露了杜林的无知。

但是,杜林一方面攻击达尔文进化论没有论证了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却说:世界上存在着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反映杜林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请问,那些彼此无关的自然产物是怎样产生的?是想搬用“自然发生论”来打掩护吗?这是枉然的。因为“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那么,昆虫等这些独立并存的无亲缘关系的动物从何而来?杜林只有求助于造物主的创造和

安排,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杜林又回到上帝、回到自然神论那里去了。

第四,恩格斯揭露了杜林把达尔文进化论与拉马克生物进化思想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拙劣手法。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综上所述:恩格斯与杜林的争论正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争论,即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杜林的“自然哲学”与姚文元的“代替论”

杜林为什么激烈地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呢?杜林是个野心家,骗子手。他胡吹自己建立一个所谓“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有一套“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原则,并且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那末,杜林当然有权全盘否定以往的历史了。杜林对他以前历史人物一个一个地漫骂,包括对伟大导师马克思进行了诬蔑。达尔文就更不在他的话下了,因为达尔文进化论也不符合他那套终极真理,自然也成了蔑视的对象了。他除了百般辱骂之外,还玩弄十分拙劣的手法。他先捏造一个观点或前提强加给达尔文,然后加以攻击;或者加以歪曲、阉割,再加以否定。同时,他一方面用含糊的话来诽谤“亲缘关系”,一方面又认为它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动”等等。杜林矛盾百出,偷偷使用折中主义。这一切都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恩格斯讽刺地说,杜林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谁不同意他,谁就是不同意真理。

杜林的哲学体系是什么货色呢?就是他设想一些绝对不变的方案、原则,即用所谓“世界模式论”去套自然界,推论出自然界知识的完整体系,建立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科学,即自然科学。这样,杜林就完全不依据科学事实,而只依据“世界模式论”从头脑中构思和推论出自然界一切现象了。可见,杜林的自然哲学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正是用自然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取消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他不是妄图用他的自然哲学来代替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吗?恩格斯指出:杜林这种终极真理的哲学体系“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以前的自然哲学已逐渐销声匿迹了。可是,杜林又照搬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复活自然哲学,这种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杜林为什么偏偏这样干呢?这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由于三大发现(细胞、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站不住脚了;同时,这些自然科学成就给马克思主义提供可靠的科学基础,并且证实和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这样,自然科学

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了。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背脊下,杜林对达尔文及其学说发动了攻击。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之后,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二千年来神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统治,对新的自然观的形成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革命导师都高度评价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意义。马克思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达尔文在生物学发展史掀起的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史上掀起的革命一样,都征服了客观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恩格斯指出:“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地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列宁指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成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传播时代,正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万古不变,而终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达尔文进化论支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它触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把它视作洪水猛兽,加以攻击。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杜林充当了攻击达尔文进化论的急先锋。这说明社会阶级斗争是一定要反映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的。

一百多年之前,自然哲学已成为死尸并腐烂了。然而现在姚文元又复活自然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猖狂的进攻。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反对、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加强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由姚文元出场,做了丑恶的表演。他说:“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¹⁾他们控制的报刊紧密配合,刮起了围剿基础理论的妖风。这些明明是公开宣扬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姚文元的“代替论”遭到驳斥,于是又授意臭名昭著的“梁效”炮制反党文章,猖狂反扑,把“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作为奇谈怪论来批判。这就是说,姚文元是“代替论”的鼓吹者。

姚文元的“代替论”,决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代替自然科学,而是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替科学研究,从而取消马克思主义,取消自然科学。这一点,可由“四人帮”在科技界、教育界的所作所为来做证明。在他们

1) 见《文汇报》1976年10月26日《‘一石’激起什么‘浪’》。